

# 马长寿

# 民族学论集

马长寿著 / 周伟洲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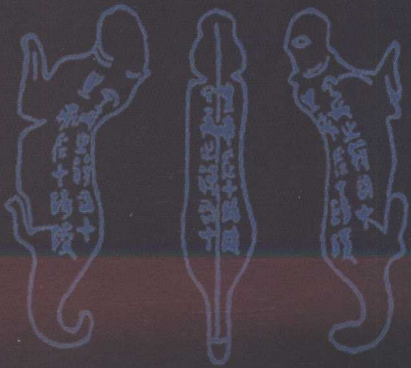
Machangshou Minzuxuelunji



马长寿著 / 周伟洲编

# 马 长 寿

# 民 族 学 论 集



人 民 出 版 社

责任编辑:张秀平  
版式设计:朱启环  
责任校对:罗世缙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马长寿民族学论集/马长寿著;周伟洲编.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3.6

ISBN 7-01-003900-3

I. 马… II. ①马… ②周… III. ①马长寿-文集 ②民族学-文集 IV. C95-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3)第 022708 号

## 马长寿民族学论集

MA CHANGSHOU MINZUXUE LUNJI

马长寿著/周伟洲编

人民出版社 出版发行  
(100706 北京朝阳门内大街 166 号)

北京昌平百善印刷厂 新华书店经销

2003 年 6 月第 1 版 2003 年 6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开本:850 毫米×1168 毫米 1/32 印张:15.25

字数:315 千 印数:0,001-3,000 册

ISBN 7-01-003900-3 定价:35.00 元

邮购地址 100706 北京朝阳门内大街 166 号

人民东方图书销售中心 电话 (010)65250042 65289539

## 前 言

1962年9月,我从西北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毕业后,考上了著名的民族学家马长寿教授的研究生,专业是中国民族史,方向是藏族史。直到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一直都是在先生直接指导下学习的。先生耳提面命,谆谆教诲,如今仍历历在目,永生难忘。

马长寿师,字松龄,1906年生于山西昔阳县一个贫苦农民家庭,靠自己聪慧的天资和坚韧不拔的毅力,在本村读完小学后,考入太原进山中学。1929年又考入南京中央大学社会学系。毕业后,留校3年,然后进入当时的中央博物院任助理研究员。1942年后,他先后在东北大学、金陵大学、东南大学、华西大学任教授,从事民族学方面的教学和科研工作。1949年后,他先后在南京大学、浙江大学、复旦大学任教授,开始由民族学转向民族史的教学和科研工作。1955年,又调至西北大学历史系,主持民族史和考古方面的工作,先后出版民族史专著多部。1971年5月,不幸在南京病逝。他的一生,是勤勤恳恳从事教育事业的一生,是孜孜不倦从事学术研究、著书立说的一生。

先生一生的学术生涯,以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来划分,大致可分为两个大的阶段。1949年前,他在中央博物

102H61/03

院和各大学任教期间,主要从事社会学、民族学的研究,以其在大学和实践中学到的近现代西方的社会学、民族学、人类学等方面的知识,坚持走民族实地调查与文献相结合的路子;不畏艰难困苦,先后深入我国西南彝族、藏族(嘉戎)、羌族等聚居区,进行民族调查,收集了大批珍贵的民族文献和文物。在此基础上,他先后发表了一批厚重的优秀论文,主要有:《中国西南民族分类》、《中国古代花甲生藏之起源与再现》(均载《民族学研究集刊》第1辑),《四川古代僚族问题》、《四川古代民族历史考证》(载《青年中国季刊》第2卷第1、2期),《钵教源流》(载《民族学集刊》第3辑),《嘉戎民族社会史》(载《民族学研究集刊》第4辑),《康藏民族之分类体质种属及其社会组织》、《凉山罗夷的族谱》(均载《民族学研究集刊》第5辑)等。

这些论文,是先生应用近代民族学、人类学的科学方法,进行民族实地调查、结合文献的研究成果,具有很高的学术水平和价值,至今仍然有着重要的学术意义。如《钵教源流》一文,是先生到嘉戎藏区调查时,由当地钵教(今译作本教或译苯教)僧人口译钵教藏文经典,以现代民族学的观点和方法进行研究、撰写而成。这是国内利用藏文典籍研究藏族原始宗教——本教的一篇重要论文,至今仍广为学者所引用。《凉山罗夷族谱》一文,以先生亲自调查材料为基础,论证了凉山彝族(罗夷)谱系之渊源,从社会发展、经济、风习等方面,说明彝族黑夷(即奴隶主)“为甄别黑姓与贱族(白夷,即奴隶)之分,于是产生了系谱制度”。文中还记录和分析了凉山黑夷孤纛和曲聂二大族谱等。先生曾两次深入四川大小凉山彝族地区调查,收集族谱30多个,结合收集、调查所得的各种资料,撰

成百万言的《凉山罗夷考察报告》。此稿系用工整的蝇头小楷书成,上附许多至今已无法见到的珍贵照片。这部具有重要价值的手稿,因各种原因,至今仍未公开出版。

1949年后,先生的学术生涯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在复旦大学任教期间,先生努力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初步掌握了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并以此指导自己的学术研究。同时,由于各种原因,先生从民族学转向了民族史的研究领域。为了教学,先生首先撰写了一部《中国兄弟民族史》讲义(打印稿),作为全国高等学校的交流教材。不久,又撰写了一篇题为《论匈奴部落国家的奴隶制》的论文,发表在《历史研究》1954年第5期上。这是先生用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作指导,研究古代匈奴社会性质的第一篇论文,也是先生第一次用唯物史观理论研究中国民族史的开创之作。

从50年代起至60年代初,先生在繁忙的教学工作中,仍然坚持民族社会历史调查,多次深入少数民族地区(四川凉山彝族地区、陕甘回民聚居地区),勤奋著述,在中国民族史研究领域内作出了突出贡献:先后出版了《突厥人和突厥汗国》(1959年上海人民出版社)、《南诏国内的部族组成和奴隶制度》(1961年上海人民出版社)、《北狄与匈奴》(1962年三联书店)、《乌桓与鲜卑》(1962年上海人民出版社)4部专著。《论匈奴部落国家的奴隶制》、《论突厥人和突厥汗国的社会变革》(《历史研究》1958年第3、4期)、《清代同治年间陕西回民起义历史调查记录序言——兼论陕西回民运动的性质》(《西北大学学报》1957年第4期)、《十年来中国少数民族研究工作的成

就》(《人文杂志》1959年第5期)等论文。此外,先生还有一批书稿,在10年浩劫之后才先后整理出版,计有《氏与羌》(周伟洲整理,1984年上海人民出版社)、《从碑铭所见前秦至隋初的关中部族》(1985年中华书局)、《彝族古代史》(李绍明整理,1987年上海人民出版社)、《同治年间陕西回民起义历史调查记录》(主编,1993年陕西人民出版社)4部。

马长寿师原本有一个十分宏伟的计划,即写十余部书,将中国古代主要的少数民族历史,按时代先后一本一本地写出来。先生已完成了古代的北狄、匈奴、乌桓、鲜卑、氐、羌和突厥、南诏的历史论著。在先生逝世之前,正着手准备撰写《吐蕃史》,已整理笺证了敦煌发现的吐蕃历史文书(用王静如先生译稿),并收集了大量的资料。然而,可恶的肺癌过早地夺走了先生的生命,这是中国学界的巨大损失。

从马长寿师整个学术活动看,先生研究的领域十分广阔又很深入;在许多方面揭开了中国民族史研究新的一页。先生不仅在民族调查的基础上,对中国西南少数民族的社会、历史、风俗等民族学方面的重大问题,提出了一些重要的开创性的观点,而且对中国西北和北方民族,如匈奴、乌桓、鲜卑、氐、羌、突厥等的历史作了开创性的研究,取得了当时所能获得的最高成就。匈奴学、鲜卑学、突厥学、藏学等,如今已成为国际学术界的专门学科,凡是从事这方面研究的学者,都要参考他的有关论著。东北的学者曾提出,鲜卑学研究的第二个里程碑,就是以先生的《乌桓与鲜卑》一书为标志(干志耿等《关于鲜卑早期历史及其考古遗存的几个问题》,载《民族研究》1982年第1期)。著名匈奴史专家林幹教授称《北狄与匈奴》一书,

“是解放后第一本具体而微的匈奴史专著，因而此书的出版，为我国史学工作者运用马列主义从事匈奴史的研究及撰写匈奴史专著，提供了一个先例”（林幹《匈奴通史》前言，1986年人民出版社）。

其次，马长寿师的民族研究，是与其独有的学业和努力，融中国史学优良传统和近现代西方社会科学精华为一体，发展成独具一格、自成体系的一个学派。先生的论著无论文字风格，还是推理考证，都是中国民族化的。文字简洁，有时带有少量文言成分，流畅生动，考证精当。既重视资料的可靠性，又继承了清代考据学的优秀传统。然而，先生的论著却没有繁琐的考证、就事论事、艰涩难读之弊，而是引进了西方近现代社会学、人类学、语言学、考古学等科学理论和方法以及马克思主义辩证唯物主义与唯物史观，与传统中国史学方法相结合，充实和发展了传统的中国民族史研究。因此，这一结合使先生的论著具有了很高的学术水平和时代特征，是中国传统史学和当代最新社会科学精华相结合的典范。

以先进的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作指导，以翔实可靠的史实为基础，史论结合，是马长寿师民族史论著的又一特色。先生论著既有丰富的史实，又有对这些史实的辨析、考证，并力求扎实、严谨、可靠，哪怕是一个重要的年代或一个古地名，也要弄清楚。同时，又不停留在这一步，像传统的考据学一样，仅辨明、考证一些史实，解决历史上一些疑难的史实问题，而是用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作指导，对已辨明的史实进行分析、研究，得出一些科学的结论来。如先生对匈奴、突厥、南诏社会性质的研究；从对乌桓、鲜卑史的研究，得出古代民族融合



的规律;从对碑铭的研究,了解古代关中民族的分布和融合等。

马长寿师已离开我们整整 30 年了。如今我们编辑的这部《马长寿民族学论集》,主要收录了先生一生中发表的 13 篇学术论文。由于这些论文,特别是在 1949 年前发表的 9 篇论文,如今已很难寻觅,且因抗战时杂志印刷条件差,纸张低劣,学界同人难以求索和阅读。因此,早在 80 年代,我们就准备将先生论文集出版,但因当时各种条件的限制,未能如愿。此事在我心中一直萦系于怀。感谢陕西师范大学和人民出版社的鼎力支持和帮助,使先生这部论集得以正式出版。谨以此书作为对我的恩师马长寿先生诞辰 95 周年、逝世 30 周年之纪念。

**周 伟 洲**

2001 年 11 月于陕西师范大学

## 目 录

- (1) 前 言
- (1) 人类学在我国边政上的应用
- (14) 中国古代花甲生藏之起源与再现
- (49) 中国西南民族分类
- (83) 四川古代民族历史考证(上)
- (107) 四川古代民族历史考证(下)
- (123) 嘉戎民族社会史
- (165) 凉山罗夷的族谱
- (213) 康藏民族之分类体质种属及其社会组织
- (301) 鉢教源流
- (336) 辟所谓“西藏种族论”并驳斥经史内所流传  
的藏族起源于印度之谬论
- (353) 论匈奴部落国家的奴隶制
- (380) 论突厥人和突厥汗国的社会变革
- (444) 清代同治年间回民起义历史调查记录序言

# 人类学在我国边政上的应用

## 一、人类学由资本帝国主义 羁绊脱离的经过

科学是人类创造的，它的产生和演进与人类的应用有不可分离的关系。人类学的一部分是一种人文科学，它的产生和演进更不容易与应用分离。欧洲的人类学不会产生于中古的封建主义时代，而产生于资本帝国主义时代，原因在此。19世纪，商人的旅行日记和传教士的会务报告便是当时人类学的主要资料。商人以白种人的尺度审量海外有色人种的体质和文化；以买卖人的态度观察采猎民族的生活与农牧民族的风俗，所以引起欧洲人的注意，而有“海外轩渠录”式的人类学出现。至于基督教的教士，比较商人自然要少势利些，但他们却不能没有偏见。他们以为基督教教义是神圣无上的，其他非基督教的信仰都是巫教魔术的偶像崇拜。他们相信单偶婚制，私有财产制是人类天经地义的制度，因而以文明人自居而排斥多偶婚制，集体产业所有权为野蛮人制度。一直到最近英帝国的 Westemarck 仍由此观点写成人类婚姻史巨著，在欧洲风行一时。所以这一时代的人类学距科学的水准太远，和

我国清末小方壶斋所辑的各种土著记载比较,只算多一种合理化的解释罢了。这时代的人类学无以名之,只可名之曰“蛮族学”(Barbarology)罢了。

但时代是进展的,人类学亦随时代而日趋开明。19世纪人称为政治上的民族主义世纪和学术上的科学复兴世纪。欧美人由于民族意识的醒觉与渴求团结和自由,帝国主义为争夺殖民地,所以产生第一次世界大战。凡尔赛会议决定了民族自决原则,即承认每个民族有形成一独立国家之权。但凡尔赛公约的规定是非常模糊的,国外的弱小民族和国内的少数民族是否仍为一民族单位呢?并无明文规定。因而在此阶段上的人文科学,被分裂为政治学和社会学是研究独立民族或列强国家的组织之学,而人类学的研究主要目标为史前的先史人与现世的弱小民族和少数民族。这种学术的分工,虽然于研究上是方便的,但无意中把人类分为两种:一种为初民或原始民族(Primitive People);一种为文明人或文明民族(Civilized man or People)。甚而把文化亦分为两种:初民只有文化(Culture),文明人始有文明(Civilization)。试问用什么尺度甄别人类的种类和文化的样式呢?没有别的,白种人的技术文明便是这种分类的最高准绳。白种人是蒸汽力、电力和内燃力的发明者,由此而发展为列强,为帝国,为资本主义。换言之,即凡为列强帝国而具有资本主义条件的民族为文明民族;反之,世界上的弱小民族和少数民族则为原始民族。于是人类学成为研究弱小民族和少数民族的科学了。

凡尔赛公约还有一个最大的缺点,即注重民族集团,而忽

视个人在政治上和社会上的地位。因而一种民族得势了,不只压迫国外弱小民族和国内少数民族,甚而压迫国内以及国外任何不同意见和不同文化的个人,否认个人在政治上的和社会上的极权主义之反抗,实为第二次世界大战主要原因之一。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结果主要是民主观念中人权纲领的产生。人权和民族权多少带一点对立性的,人权纲领为民族主义的修正,乃此次战争最大的成果。1943年英国 E. H. Carr 计划和平草案时,于其和平之条件一书中说:“国籍与自决是指同一事件,如果一个人有两个客观的区别之点,即或为波兰人,或为南斯拉夫人,他愿意作一波兰的公民固可,作一南斯拉夫的公民亦无不可。”此一原则成为战后人权纲领的主要成分。在这里人类学跟着时代要变了。美国社会学家和人类学家近年逐渐放弃 Primitive Society 而试用 Folk Society 一辞,便可表明这种改变的倾向。“原始的”一辞是不科学的,它们既然反对进化论派,便不应向人类之原始的和究极的两个顶点上转弯。现世民族并没有历史区别的观点在内,只有先史民族才可叫作原始民族。无论白种和有色人种都是人,列强国民和弱小国民以及统治民族和少数民族都是民。Folk 便是上述各种人民的概辞,人类学应当是研究人民及其文化的科学。人类学的原则可适用于弱小民族和少数民族者,自然亦当适用于列强的所谓文明民族。无论如何,人类学不当浸淫于蛮族学或弱小与少数民族之学的领域中了,应当开拓到人类全体及其文化的整个领域之上。

## 二、英美荷澳诸列强之应用人类学的实施

我们如谓人类学为 19 世纪资本帝国主义的产物,即今日之应用人类学乃 20 世纪列强政治制度与经济制度矛盾的产品。政治上的平等自由已经是法国革命以来最流行的口号了。两次世界大战以来,又多了一条民主的口号。国内政治是照这民主自由平等的理想迈进的,但对于异国民族以及本国殖民地内的少数民族却不敢提到自由平等民主。此乃政治制度的矛盾。同时,若干国家,如英美,在政治上是提倡民主,乃至实行民主的,所以在理论上他们是十分同意殖民地的民族自决、民族独立。但在经济上,无论国内的与国际的,始终建设于资本主义之上,为了攫取工业资源,为了觅得商业市场,所以不但不能放弃殖民政策,还须进一步强调之,调和之,彼此勾心斗角地在变相地攫取殖民地。此岂非列强国家之政治制度与经济制度中间的一大矛盾? 现在民族自决运动在世界上每个弱小民族领域里策动着、进行着。谁是策动这种运动的主力呢? 不是苏联,亦不是土著民族自己,而即是列强各国 19 世纪的民族主义和 20 世纪的民主观念之余波。所以说策动殖民地民族自决的便是殖民地所有者的列强。因此之故,美国不能不承认菲律宾独立,英国不能不允许多国自治。但菲律宾能算独立,印度果能自治吗? 我们可以干脆地预料,在英美放弃其资本帝国主义之前,决不会让它们的殖民地真正独立自治的。政治的民主可以让殖民地人民由直接统治到间接统治,由压迫统治到委托统治,甚而可以允许他们自治。

但经济的资本主义和这一套政治实施根本是冲突的。列强经济不能独立实为殖民地政治不能独立的主要原因。如何调协这种不调和的场面呢？政治学和经济学于此束手无策了，这时乃请熟习殖民地情况的人类学家作最后的调协，于是便有应用人类学的产生。应用人类学是利用人类学的原则、观点、方法以及知识于帝国殖民行政上的一种技术科学。

在列强里，英帝国的殖民地最多最广，因此应用人类学在英国最为发达。在 1896 年，英国学者 E. W. Smith 创设帝国民族学社 (Imperial Bureau of Ethnology)，搜集资料，曾自许“于科学及政府有重要价值”。其后，遣派人类学家赴诸殖民区域考察，如 Malinowski 等之于南非苏丹；Elkin 之于澳洲西部南部；Chimery 之于新几内亚；Rattray 之于金海沿岸；Meek 之于尼日利亚；Hutton 之于印度，皆于各殖民地之政教经济风俗洞悉无遗。英政府设有殖民局 (Colonial Office)，内分设各种委员会，指令各大学作各种殖民问题的研究，同时又在各大学设殖民地官吏士兵训练班。如在牛津和剑桥两大学规定人类学为殖民地海陆军候补官兵必修课程。伦敦经济政治学院与伦敦教育研究所皆开有殖民地官吏训练班。阿伯丁 (Aberdeen) 大学设有宣教殖民计划局。皇家人类学会设有专门委员会讨论国家殖民地问题。罗德斯立文斯顿中非研究所 (The Rhodes Livingston Institute of Central Africa Studies) 为 1938 年所创立，由政府补助下进行罗德细亚及其中非英属地带之殖民问题研究。同年伦敦组织非洲语言文化国际研究所研究两个那色兰部族 (The Nyasaland tribes) 的营养问题。并在 Malinowski 的指导下训练许多青年学习，送往南非服务。又有种族关系研究

所设在南非,专门研究南非人种与白种人的关系问题。总之,英国政府与本国人类学家是尽量合作的。各殖民地政府普遍皆有人类学专员之设。它是殖民政府的顾问,同时又不断进行研究,以其意见供献给政府。

美国的殖民地虽少,但人类学与殖民行政的合作未尝或息。在菲律宾,Boyer 教授等研究该岛的土著部族并设计改革计划,帮助该地政府进行人口调查并予以说明。在美属沙毛亚岛上,由人类学家 G. G. Brown 计划,以巴斯陶(Barstow)纪念基金创立一实验学校,与当地海军长官合作训练土著贵族子弟,使其将来成为理想的领袖。美国本部设一太平洋关系学会,虽为一私人组织,其研究主题则为美国及其领土之应用人类学的研题。耶鲁大学、海威夷大学以及其他大学都集中于殖民问题的研究。新近亦有“应用人类学社”,主要兴趣在于殖民行政的研究。关于国内民族的研究和实施机关,有印第安事务部(Office of Indian Affairs)和农业部的推广局(Extension Division of Department of Agriculture)都是致力于应用人类学的研究,获有相当经验,可以推行殖民区域的。此次世界大战,美国人类学家为本国士兵著有《生存法》(Survival)一书,教导他们在陆上、海上、荆林、两极地带如何能活。同时,若干专门人类学家直接参战,主要任务在集中视线于殖民地前线的研究。其报告如《人的管理》(The Government of Man)即为已经出版的一种。

荷兰亦为拥有殖民地较多的国家,在莱登大学(Leiden Uni.)和乌特来希大学(Utrecht Uni.)设有 人类学的训练机构,专门训练派往荷属东印度群岛的官吏。1906 年至 1914 年派了许多考察团到东印度群岛和其他殖民地,研究其语言与文



化,尤其东印度的习惯法为荷兰所采用,为制定民法之基础。荷兰京都的殖民研究所(The Colonial Institute)致力于殖民地土著的研究,最为驰名。

澳洲于 1923 年举行太平洋科学会议,决定应用医药科学和人类学的原理以保护土著种族为当务之急。前此不久,澳政府在巴布亚设有政府人类学家(Government Anthropologist),由 F.E. Williams 充任,直至 1943 年死亡而止。荷兰已故的 H. Murray 总督常宣称他的行政乃“建设于科学的人类学原则之上”。由于如此,澳洲的石器时代的土著因而始能跨进文明的初阶。1924 年荷兰又设一政府的人类学家于新几内亚。各地海陆军官佐,每隔两年必送澳大利亚的赛奈大学(Sydney Uni.)受社会人类学和行政人类学的训练一次。虽前任将校亦须上班训练,教以特殊的课程。

此外,如法国、比利时、德国都有或多或少的人类学与殖民行政的配备。殷鉴不远,日本在占领我国东北各省期间,研究东北经济资源的有南满铁路株式会社,满洲经济社,满洲重工业开发株式会社,大连满铁社员会,日本东亚开拓社,日本生活社;研究地理、语言以及文化的有满洲事情案内所;研究一般社会情状的,有满洲日日新闻社。上述诸研究机关,都是由日政府支持的,虽然不是纯人类学的应用,但有不少的人类学家参加在内。

### 三、中国边疆的特质与中国人类学的建立

中国边疆有异于列强殖民地的性质,综括有下列各种特